

論空想社会主义者

LUN KONGXIANG SHEHUIZHUYIZHE

沃尔金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31.592
234



論空想社会主义者

沃 尔 金 著

中国人民大学編譯室譯

21602/13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論空想社会主义者

沃尔金 著

中国人民大学編譯室譯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廠橋西大街門牌28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71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华書店經售

*

書号:2193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張:17— $\frac{1}{4}$

字數:468,000 册數:9017—19023(7+10000)

1969年10月第1版

1969年11月第2次印刷

統一書号:3011·83

定價(4):1.70元

前 言

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数量非常龐大，而譯成中文的目前还只有个别几本。为了帮助讀者較全面地了解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主張，給讀者提供一本研究空想社会主义的提示性的書，我們編譯了这本文集。

本文集是由苏联著名历史学家維亞切斯拉夫·彼得洛維奇·沃尔金院士所著的二十篇文章彙集而成的。其中除“古希臘的社会主义”和“約翰·弗蘭西斯·布雷”兩文譯自他的“社会主义史綱”(1935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外，其余主要是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驅者叢書”(苏联科学院出版，沃尔金院士主編)所写的导言。

本書所介紹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处的时代从古希臘直到19世紀中叶，他們所臆測的理想社会的方案形形色色，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廣泛，包括哲学、历史、政治、經濟、宗教、教育、生产和生活組織等方面。沃尔金院士对所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全面的精闢的論述。在編譯这样一本書的过程中，我們遇到的問題是不少的。特別由于譯者水平所限，譯文錯誤在所难免，为了便利讀者而作的注釋也很可能有不妥之处，希望讀者指正。

在本書編譯过程中，原著者沃尔金院士給了我們很多帮助，他对这本書的編选計劃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并把其中我們所收集不到的几篇文章寄給我們，才使本書成了現在这个样子。他在来信中并說，这些論文能够和中国同志們見面，他感到非常高兴。对沃尔金院士的热情帮助，我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譯 者

目 录

前 言

古希腊的社会主义	1
“烏托邦”的历史意义	63
康帕內拉的共产主义空想	76
掘地派与温斯坦里	88
17世紀的一位法国空想主义者 (德尼·維拉斯)	107
梅叶及其“遺書”	132
馬布利的社会學說	158
摩萊里的共产主义理論	172
“平等派”运动及其社会思想	197
威廉·葛德文的社会思想	219
聖西門的社会學說	248
早期聖西門主义的社会學說	281
傅立叶的体系	308
罗伯特·欧文	341
布朗基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	371
比埃尔·勒魯——聖西門主义的后繼人之一	400
約翰·弗蘭西斯·布雷	421
埃蒂耶納·卡貝	440
德薩米的空想共产主义	472
讓·雅克·皮佑 (空想共产主义史問題)	505
注釋	526
人名索引	537

古希臘的社会主义

—

东方和远东古代社会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因素，无论它們本身如何饶有趣味，但对社会主义学說史的意义是不大的。对于它們的社会經济基础，尤其是对于它們的流傳范围和影响大小，我們知道得太少了，所以不能利用它們作出科学上的結論。另一方面，它們同社会主义后来的发展根本沒有联系，它們在消逝以后并未留下任何痕迹。古希腊的情况則不同。在这里，我們拥有充分得多的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根据。在这里，我們拥有明确得多的資料，它們說明了各次社会运动的性質和使我們发生兴趣的各种理論体系的内容。最后，在这里，除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以外，我們还看到有些学說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它們的个别論点对于近代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具有重大的影响。本文的任务就是把那些对研究社会主义史有一定价值的古希腊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想加以扼要的評述。

1

远在荷馬时代¹，希腊社会已經是一个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是一个阶级分化非常明显的社会。在社会的一个极端，是拥有大量土地的、有权势的、富有的貴族，他們有很大的势力，拥有从属于他們的小民和附庸。在另一个极端，則是沒有土地的雇佣工人以及处于最底层的、沒有自由的奴隶。大部分人是中間阶层，也就是靠自己的一塊或大或小的土地为生、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隶属于貴族的

农民。在交换比較不发达的情况下，在自給性生产占統治地位的条件下，貴族与农民之間的关系尚具有父权制²的性質；社会对立的現象无疑已經出現，但还没有明显地反映在群众的意識中。被統治者的不滿有时也表現出来；然而，尽管这种不滿情緒在个别場合下会勃然爆发，把貴族看成是群众的天然保护人的观念还非常流行，并且有巨大的社会影响。但是，在这里，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某种演进过程的最初因素，这一过程將不可避免地引起阶级矛盾的尖銳化和群众社会覺悟的苏醒。在荷馬时代，虽然自然經濟关系占統治地位，然而已經出現社会分工的萌芽和商业关系的萌芽。在荷馬时代的希腊已經有手工业者和商人，他們是从占有土地和耕种土地的全體居民中間分化出来的。他們的活動范围极其有限，他們几乎完全是为少数消費者——大地主而工作的。那时还不存在作为工业人口中心的城市，手工业者是用定貨人的材料来制造产品的，那时还没有鑄币，商人直接用当地的产品来換取外国的产品。然而，貨幣經濟滲入社会机体的各个細胞的时代已經临近了，把工商业与旧統治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那条臍帶断裂的时刻已經临近了。

从紀元前8世紀开始，希腊各城邦的貨幣經濟逐漸增長，而在7世紀增長尤其迅速。过去的偶然的商业关系逐漸成为經常的关系，为数众多的希腊殖民地就是形成这种关系的基地。

希腊的殖民时期就是希腊商业发展的时期，反过来，发展商业又是殖民的动力。希腊商人从殖民地以及通过殖民地从其鄰近的野蛮地区輸入宗主国的貨物，已經不仅是供貴族享用的奢侈品。他們开始从这些地区輸入原料和食品：谷物（黑海沿岸产）、牲畜、皮革、魚类、木材、金屬等。另一方面，殖民地和野蛮地区也开始需要宗主国的产品，主要是工业品。希腊手工业的銷售市場迅速地扩大着，同时手工业的状況也逐漸改变。荷馬时代的流浪的匠人被工匠所代替：前者是用定貨人的原料来生产的，而后者則在自己的作坊中用自己的原料来为广大市場生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出口而生产的。由于当地的条件和市場的需求，某几种手工业兴盛起来。在紀元前7世紀，希腊

已經輸出金屬制品和陶器；在紀元前6世紀，已經輸出花布、粗呢等。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兴起了新的中心——便于商业往来的沿海城市。在这些城市中聚集着新的工商业人口，形成着新的生活方式，孕育着新的思想，产生出新的政治派别。

随着工商业中心的发展和它們的重要性的加强，在那些依附于它們的农业地区中，原有的父权关系也日漸崩潰。农业产品获得了市場，首先是鄰近的、比較狹小的城市市場，然后再是比較广大的海外市場。农业和畜牧业开始为当地的城市市場生产，市場的扩大还造成对較高級的作业——葡萄种植业和園圃业(种植橄欖)的需求。农产品可以出售，这就剧烈地改变了大地主和从屬於他們的小民之間的关系。大地主在物質上剝削农民的慾望，随着貨幣经济的发展而大大加强。在过去，一般說来，自己庄园的产品和匠人的产品就能够綽綽有余地滿足他的有限的需要，但現在則加上了对万能物品——金錢——的貪得无厭的、新的需要。如果沒有金錢，无限美妙的城市市場的大門对他便是关着的。地主們开始了解，如今金錢就是权力，金錢把旧的阶层等級“搞得乱七八糟”，他們旧日的权势在金錢的勢力面前逐步退縮。地主可以有兩種办法取得更多的錢：或是靠吞併农民的土地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或是以这种或那种借口迫使保留着土地的农民繳納各种款項。看来，这兩種办法希腊地主都曾經采用过。

推动地主向农民进攻的那些因素，同时还削弱了农民的自卫能力。在貨幣結算方式滲入农民經濟的初期，农民經濟的稳定性不可避免地受到破坏。农民不是很快就能适应貨幣經濟的。考虑市場上不断变化的需求，这对农民來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在需求的变化要求农业生产作某些改变的情况下。例如，橄欖种植业在后来是雅典农民富裕的基础，但在最初改种橄欖时，人們感到这是旧經營方式的一个变革，这种变革需要資金，而农民是沒有資金的。农民甚至在年成較好时也需要借債。生产上的挫折很容易使他們負債累累，一輩子翻不了身。这种債務正便于地主达到他們的目的。

正如上面所講的，这种債務在某些情况下終于使农民失去土地，

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則使他們淪為奴隸。凡是農民對貴族的依附關係在過去表現得特別厲害的地方，另一方面，凡是農民仍然以單槍匹馬的方式同地主進行鬥爭的地方，凡是農民未獲得強有力的城市居民的支持的地方（例如在帖撒利亞），上述過程都徹底完成。但在城市和城市工商業發展較早的阿提刻³，情況則不同。在這裡，正如在許多其他商業城邦中一樣，由於經濟重心轉移到城市，在公元前7世紀下半葉和6世紀初發生了政治革命，它摧毀了貴族的絕對統治，遏止了農民淪為奴隸的過程。在科林斯、墨加拉、西庫翁等地，也發生了和雅典革命相類似的革命。這些革命的基本社會政治要求，符合新興的城市居民的利益；革命的勝利使城市集團躍居首位。然而，籠罩城市的騷動，不可能不激動半無產階級化的、為奴役性債務所苦的農村，不可能不促使農村起來反對同一個敵人——貴族。

關於這些政治覺悟很低、自發地起來反對壓迫者的群眾的要求，我們知道得很少。不過，我們多少知道一些他們的活動情況以及統治者用來安撫他們的措施。墨加拉地區的農民運動特別堅決和劇烈，那裡的農民群眾把貴族的財產奪去一部分，毀掉一部分。在雅典，梭倫採取免除農民的沉重債務負擔的辦法，有效地防止了這種自發的、破壞性的土地革命。由此可以清楚地了解農民的主要願望。農民群眾極端仇視那個利用貨幣經濟發展的條件來奴役他們的階級，他們不是籠統地反對貨幣經濟，而只是反對貨幣經濟的發展給他們帶來的沉痛後果。鼓舞他們的是某種平均主義的理想，而絕不是社會主義的理想^①。紀元前7—6世紀的革命時代，無疑地標誌着古希臘階級矛盾的意識的蘇醒。然而，希臘土地上第一次出現的這種階級利益的大規模衝突，同共產主義思想完全無關。農民在革命時代達到自己的目的，保全了自己的小塊地產以後，便長期地固定在这种地位上。為適應新

① 現代的許多資產階級歷史學家都傾向於把這兩個概念混為一談。這通常是“抵毀”社會主義的方法之一。這種傾向特別明顯地表現在皮爾曼所著的“古代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史”一書中。參看沃爾金著“社會主義與財產平均主義”一文，“社會主義史綱”1935年蘇聯科學院出版社版第378—392頁。

經濟条件而产生的严重危机,对农民來說,已經过去了。小农园圃业和葡萄酒釀造业相对繁荣的时期开始了;这种繁荣也反映在政治領域中,表现为克力斯提泥的改革。

一般說来,革命后的时期是希腊經濟生活高度兴盛的时期。希腊的商业無論在地区范围上或是在經濟影响上都扩大了;在希腊的商业中心积累了大量的資本^①。不言而喻,商业資本的增加,不可能不影响工业。由于手工业不得不为广大的市場进行生产,而离开商人这一中間环节便不能同市場取得联系,同时手工业在原材料的供应方面也不得不依賴商人,因而它終于不可避免地陷入对資本的彻底依賴。手工业者在表面上保持着經營的独立性(拥有自己的作坊、自己的設備),但实际上只是商业資本操縱的生产体系的一个組成部分。手工业者主觀上是从最容易理解的方面体会这种对商业資本的从屬关系的,他們認為这种关系不是生产上的依賴,而是單純金錢上的依賴,是債務关系。

然而,对手工业者來說,問題还不限于債務关系。商业資本为了寻求利潤来源,并不滿足于能够支配手工业。商业資本在积累到一定限度以后,便开始直接侵入生产活动領域,在那些由于市場条件而获利最厚的生产部門中組織工业企业,成为手工业的竞争者。在希腊出現了工場手工业,然而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工場手工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工場手工业。在荷馬时代就已經存在奴隶制度,不过那时的奴隶人数很少,他們主要为貴族从事家务劳动,仅仅有少部分時間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而現在則开始从国外輸入奴隶,如同輸入其他商品一样,并且讓他們在手工工場中从事工业劳动。由于能够使用便宜的奴隶劳动,这就自然阻碍了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妨碍了真正的工业資本主义在古希腊获得发展^②。但是,無論如何,它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一个前提,这种生产方式在經濟上是不同于手工业的。采用

① 可惜我們沒有关于該时期私人資本数額的精确資料。我們所掌握的較晚时期的一个数字是30塔蘭同以上。按照別洛赫的計算,当时的50塔蘭同折合19世紀末的150万盧布。參看別洛赫著“希臘史”第2卷第280頁。

奴隶劳动的工场手工业排挤着手工业，在某些部門甚至把手工业完全挤垮、它把手工业者变成了雇佣工人，这些人在不久前还拥有自己的作坊，而現在則被迫同奴隶一样地在他人企业中作工^②。个体生产者逐渐为某种生产集体所代替，集体的規模当然不很大。我們所知道的当时最大的“工厂”，仅有120个奴隶在干活。大部分“工厂”的規模还没有这样大^③。这种“工厂”拥有的劳动工具非常原始，并不比手工业中的劳动工具更为高級。虽然如此，自由的独立手工业还是經受不住它的竞争。

上述这种演变使紀元前5—4世紀的希腊城邦出现了大批的半无产者和无产者，而另一方面則形成了奴隶主、工业企业主^④、大商人和銀錢业者这一有权势的阶层。城市居民逐渐分化，这两部分人之間的裂痕在以后不可避免地日益扩大。奴隶主和商业资本家在国家中和社会上取得日益重要的地位（甚至在当时的民主国家中也是如此），而劳动者的地位則不断下降。自由工人被迫同奴隶一起作工。他們和奴隶处在同样的劳动条件下，領取同样的工資^⑤。他們彼此是劳动伙伴^⑥；然而，在上层階級看来，奴隶是活的机器。自然而然地，自由的工人也开始被看做是工作的机体^⑦。奴隶和自由民混杂在一起的这

② 迈耶尔企图把紀元前5—4世紀的雅典的“資本主义”同18—19世紀的英国和德国的資本主义等量齐观，并把雅典的手工业場与現代的工厂相比拟，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參看迈耶尔著“古代史”德文版第3卷上册第550頁，以及迈耶尔著“古代的奴隶制度”（俄文譯本）。

③ 辛曼“希臘国家”英文版第253頁。

④ 别洛赫“希臘史”第2卷第227頁；吉勞“古希臘的工业劳动力”法文版第86頁。

⑤ 奴隶主經常不是工业企业主；他們或是把奴隶租給企业主，或是讓奴隶自己寻找工作并交納代役租。參看吉勞一書第130—132頁。

⑥ 例如，在建造厄勒修斯庙时，有27个公民、40个外邦人和15个奴隶从事同一工作，并且同样地每人每天領取一个达拉克姆。參看佛朗考特著“古希臘的工业”法文版第1卷第316頁，第2卷第205頁；吉勞一書第197頁。

⑦ 辛曼“希臘国家”英文版第258頁。

⑧ 皮尔曼“古代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俄文版第367—368頁。

种情况，在民主的雅典多少改善了奴隶的境遇，这就引起了民主制的敌人的不满^①。然而，对自由劳动逐渐地也采取了通常对奴隶劳动所抱的那种轻视态度。在上层阶级中间，对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尊重日趋消失。在上层阶级和平民之间，除财产上的悬殊以外，又形成一道精神上的鸿沟。不言而喻，平民也对上层阶级采取了新的态度，他们充满了仇恨和愤怒。在希腊城市中，不仅阶级对立现象增强，而且人们愈来愈强烈地意识到社会上存在的矛盾，残酷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日益发展。

在许多城邦中，农村平民——丧失土地的、无产阶级化和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也同城市平民联合一致反对富人。商业和高利贷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资本，无孔不入地企图侵入农业领域。甚至在阿提刻这个依然以殷实中农为基础的国家中，地产转移的现象在纪元前4世纪也很盛行。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地主，他们是城市人，是富有的暴发户。发了财的高利贷者或商人，不是向不善于适应新经济条件的落魄贵族收买土地，就是向那些因种种不利情况而破产的农民收买土地。凡是橄榄种植业和葡萄酒酿造业发达的地区，农民比较牢固地保持了土地，并给予这种进攻以较强烈的反抗。凡是谷物种植业仍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农民的地位很不稳定，上述过程便造成地产的高度集中。农民或是变成耕种别人土地的自由佃农，或是成为大型农业企业中的雇佣工人。在这些企业中，他们和他们的城市伙伴一样，会遇到奴隶劳动的竞争。在纪元前5—4世纪的社会斗争中，农村平民的呼声比城市平民的呼声更加响亮。

到纪元前5世纪，在希腊的各个城邦中，雅典的工商业最为发达。由于这种情况，雅典便能够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支配许多其他城邦，并能够建立起一种独特的霸权，这种霸权反过来又成为雅典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雅典运用霸权使其经济达到希腊前所未有的高度繁荣，使大量的资金流入雅典。这些资金的分配自然是极不均匀的。资

① 参看所谓伪色诺芬“雅典政体论”⁴第1卷第10—12页。

本家和奴隶主阶级的奢侈富有，达到当时人们难以想像、令人愤慨不已的地步，而下层平民则濒于赤贫。社会上的情况形成极刺目的对照。虽然如此，雅典无论在其霸业鼎盛时期，或是在其霸业相对衰萎和彻底崩溃时期（紀元前4世紀），都沒有发生反对現制度基础的社会运动，甚至也沒有发生反对現行财产分配方式的社会运动。繁荣的工商业以及高利貸和承包活动的首腦人物，善于用巧妙的政策来防止这种运动，并把群众的迫切願望导入另一軌道。統治集团通过发放各式各样的補貼（参加法院工作、人民大会、戏剧活动等等的津貼），通过广泛兴办公共工程，使雅典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感到自己仿佛也参加瓜分从各附屬城邦鹵获的財物。这种蠱惑人心的經濟政策，絕沒有把雅典的无产者变成食利者或有閑者，而仅仅是給予他們一些必要的補貼以弥补其工資的不足^①。他們仅靠補貼是不能維持生活的。但是，毫無疑問，補貼制度腐蝕了无产者，使他們慣于認为摆脱經常貧困状态的出路不在于对剝削阶级进行斗争，而在于扩大自己在国家收入中的分配額。于是，拥有資本的上层公民便能够利用这些收入收买下层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誘使他們放棄自己的社会要求。雅典的平民便被束縛在善于控制希腊其他城邦的雅典商业奴隶主阶级的凱旋的战車上。实际操縱雅典政治的阶级了解到这一点并利用了这一点，因此在平时他們可以把政治統治的职能交給平民执行。麻痹雅典平民的社会要求的那些措施，加深了平民掌握政治大权的假象。

在紀元前4世紀，即在雅典的霸业遭遇危机的时期，雅典的社会状况也日趋緊張。然而，甚至在这种时刻，不管怎样，雅典始終沒有爆发社会激变，而我們知道，这种激变在当时比較不发达的希腊城邦中是发生过的。对于大部分的希腊城邦來說，从紀元前5世紀中叶开始的这一时期，是社会深刻动盪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战争，不仅有城邦之間的战争，而且有反对富人、反对当权的富人寡头集团的战争。社会秩序毫不稳定。該时期的非常特出的一点，就是任何一个城邦要同

① 在紀元前5—4世紀，雅典的名义工資不断提高；然而，工資的提高很难赶上消費品价格上涨的程度。

另一个城邦作战时，不仅必須考虑外部敌人的力量，而且也要考虑它能否从内部敌人那里获得必要的支持。

可以举出不少由于对外战争而爆发革命的例子。紀元前427年，科賽刺島发生了革命。起义的平民摧毁了沿海的商业中心，并对当地的上层阶级进行了七天的杀戮。紀元前412年，薩摩斯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据历史学家的記載，有200个富有公民被杀死，600个富有公民被放逐。这些人留下的财产被人民分掉了。紀元前370年，亞各斯又出現同样情况，那里的平民杀死了一千多个富人。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土地占有制特别发达的西西里島各城邦，在紀元前5—4世紀发生了多次的流血革命。紀元前422年，列安提尼城邦的平民曾企图重新分配富人的土地，但富人在叙拉古城邦的帮助下防止了革命的发生。紀元前416年，叙拉古城邦的富人的土地却被狄奧尼修斯划分成若干小块，分配給他的士兵。在以后的一百年間，叙拉古城邦不断地发生政变，所有这些政变都帶有一定的社会色彩。例如，紀元前317年亞加多克勒发动的政变，就以实现真正的自由、廢除债务和分給穷人土地为口号①。

紀元前3世紀斯巴达所发生的革命运动，具有独特的性質。但該时期的一切社会运动所共同具有的某些特征，在斯巴达的革命运动中也极其突出。在紀元前5世紀以前，工商业落后的斯巴达还保留着古老的土地制度。当时，在斯巴达存在着两种地产：一种是利用赫罗泰(农奴)劳动的、享有特权的、殷实的地产(斯巴达公民的土地)，另一种是没有特权的地产(珀里俄科的土地，即边区居民的土地)⁵。在紀元前5—4世紀，斯巴达的这种古老的土地制度即貴族土地数量大致相等的制度，由于貨幣經濟的发展而彻底破坏。全国的土地集中到少数几个家族的手里，这些家族便構成当权的寡头集团。除去寡头集团以外，在貴族中間形成了一批失去土地、权利縮小的落魄者。看来，在非貴族的地产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集中过程。然而，在特权者中

① “修昔的底斯文集”第3卷第70頁，第8卷第21頁；“狄奧多文集”第14卷第7頁，第19卷第6—7頁。

間，在因貨幣經濟發展而陷入困境的斯巴達公民中間，對已經形成的這種關係表示強烈的不滿。共和國舊政權的代表人物——國王成為這個運動的領導人，並不是偶然的。這個運動雖然是以下層貴族恢復自己的財產狀況的主觀要求為基礎，但在客觀上它同時又是爭取保全整個貴族階層的鬥爭。因為，毫無疑問，隨著大部分貴族失去作為這一階層的經濟生活基礎的土地，隨著一小撮寡頭在大部分貴族破產的基礎上飛黃騰達，這一階層本身以及它過去具有的战斗能力都逐漸消失。

在斯巴達，革命的情緒早已成熟。這種情緒的某些徵兆在紀元前4世紀初已經覺察到。但是，直到紀元前3世紀40年代，它才明確地表現出來。到紀元前243年，要求改變土地關係和整個財產關係的派別已經如此強大，以至能够使一位國王——阿基斯參加到他們這一方面來，甚至能够在監察官的選舉中取得勝利，而監察官過去經常是寡頭集團的支柱。勝利者立刻提出了廢除債務和重分土地（既包括特權階層的土地，也包括珀里俄科的土地）的法律草案。草案規定，斯巴達公民的土地應該劃分成4500塊同樣大小的土地，珀里俄科的土地應該劃分成15000塊。由於享有特權的地產長期地處在危機之中，斯巴達公民這一階層顯然已經大傷元氣，因此他們打算把一定人數的珀里俄科（邊區居民）轉為斯巴達公民，以便使這個階層增添一些新生的力量。然而，特權階層和非特權階層這一區分本身，更不用說農奴勞動，仍然應該是絕對不可侵犯的。改革者並沒有能够用合法的方式制止寡頭集團的反抗；只是經過國家政變，採用了暴力，他們才獲得勝利。可是，這種勝利也只是短時期的。改革派還沒有來得及實現自己的方案，保守派便重新取得勝利，改革事業化為烏有，其領導人一部分被處死，一部分被放逐^①。

但是，這個運動是不可能徹底鎮壓下去的。僅僅經過了幾年，斯巴達又發生了新的革命，這次革命的領袖又是一位國王——克利奧

① 普盧塔克“阿基斯傳”。

墨尼。克利奥墨尼在执政的最初几年,由于对亞該亞同盟⁶作战的胜利,無論在人民中或是在軍隊中都受到普遍的爱戴。紀元前227年,克利奥墨尼率領一队雇佣兵开入斯巴达,杀死了所有的監察官,并把大約80个公民驅逐出境,于是真正掌握了全部政权。在政治改革以后,接着又进行社会改革,这次改革差不多完全实现了阿基斯未能实现的計劃。和他的失敗的先驅者不同,克利奥墨尼徹底地完成了这一事业。他把土地划分成4000塊,其中一部分分配給失去土地的斯巴达公民,一部分分配給划入斯巴达公民阶层的珀里俄科。無論是等級制度或是农奴制度,克利奥墨尼的改革以及阿基斯的改革都沒有触犯。克利奥墨尼所实行的制度維持了5年,終於在国外反动势力而不是国内反动势力的打击下被摧毁。很明显,斯巴达的土地改革不可能不鼓舞希腊其他城邦、特别是伯罗奔尼撒各城邦的不滿現狀者。其他城邦的这种内部騷动,以及斯巴达由于实行改革而在軍事力量上的某些加强,使斯巴达軍隊在对外部敌人的斗争中取得一系列的胜利。然而,这些情况势必促使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斯巴达,因为重分土地的願望威胁了他們的利益。由于面临这种威胁,他們不得不投靠馬其頓王朝⁷,并在其帮助下給予克利奥墨尼的实力以致命的打击。紀元前222年,馬其頓王安提俄那在塞拉西亞一役击潰了克利奥墨尼,并在斯巴达恢复了旧的土地关系。然而,長时期內这里都沒有能够真正恢复秩序。紀元前206年,斯巴达发生了新的政变,这一次要比过去激烈得多,对富人进行了杀戮,夺取财产,大肆破坏。一直到被羅馬人征服为止,社会騷动在这个国家中繼續不断地发生,并且不止一次地猛烈爆发^①。

尽管阿基斯和克利奥墨尼的活动过程在表面上存在着各种区别,尽管克利奥墨尼的革命主要是軍事性質的,然而这两次改革的社会思想还是相同的。毫無疑問,这两次改革是談不到社会主义的。它們一点社会主义的因素都沒有。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阿基斯和克利奥

① 普盧塔克“克利奥墨尼傳”。

墨尼的方案都同样保存对农奴劳动的剥削和把公民划分为特权阶层和非特权阶层的制度，都同样没有集体组织生产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些方案称为平均主义的或财产平均主义的方案。即使如此，它们的财产平均主义也是特殊的财产平均主义。这种财产平均主义首先要平均特权阶层的财产，这是它的主要目的。其次，非特权阶层的财产也要加以平均，然而是根据不同的原则并与特权阶层分开进行的。这种斯巴达贵族财产平均主义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当然，绝不是企图消灭阶级制度。斯巴达的改革者丝毫也没有这种思想。鼓舞他们的是另一种根本不同的幻想：通过极端的措施，把那个抵不住货币经济的发展而陷于土崩瓦解的贵族阶层，以及把整个濒于灭亡的旧制度从毁灭中拯救出来。他们的任务在实质上是反动的，尽管他们是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的。这项任务同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因而注定是不能实现的。

由于这种鲜明的贵族阶层的倾向，斯巴达的社会运动便具有了某种特点。然而，古希腊的一切其他社会运动，也都具有特权阶层财产平均主义的一般特征。其中没有一次运动能够从平均财产的思想提高到公有化的思想，没有一次运动曾经企图把它的平均财产的措施，扩展到本城邦公民或该次运动参加者的范围以外，也就是说永远局限在一个或大或小的有限的范围以内。没有一次运动曾涉及非自由劳动者——奴隶的命运，这也不足为奇。参加这些运动的广大群众由下列三类人组成：失掉土地或负有债务的农民，落在商业资本手掌之中的手工业者，以及在手工作坊、公共工程等场所与奴隶一起劳动的雇佣工人。前两类人自然只希望摆脱债务和收回土地。他们由于自己的地位，不可能超出小私有者的眼界。然而，第三类人大多数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工业和农业中劳动的集中化还远未达到如此的水平，集中劳动还远未如此普遍，以致能够使昨天的小私有者——今天的雇佣工人在精神面貌上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化。集体组织生产还没有被认为是某种必要的东西。重新回到独立手工业，看起来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技术上手工作坊并不高于手工业。而另一方面，雇佣工